四条底线倒逼上海努力建设高品质城市

诸大建

新民时论

如果说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是上海“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那么有底线的发展,可以说是上海“十三五”规划的最大亮点。其中,标志性的东西是上海的发展要遵守四条重要底线,即常住人口规模底线、建设用地总量底线、能源消耗总量底线、城市安全底线。可以说,四条底线就像四条鞭子，将倒逼上海努力建设四类高品质的城市。

常住人口规模底线倒逼上海建设宜居城市。上海常住人口总量现在是2400万,“十三五”规划确定到2020年常住人口规模不超过2500万,意味着未来5年中每年人口增长数量要控制在20万人以内。应该认识到这是上海加强以人为本的承诺,目标是要更好地建设宜居城市。其倒逼作用体现为:一是推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它的实质是要承诺进一步把上海的公共服务、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搞上去，而这正是城市发展有质量的体现。二是推动上海发展从依赖劳动力的数量转移到依赖劳动力的质量即人力资本上来。

建设用地规模底线倒逼上海建设紧凑城市。“十三五”规划提出上海建设用地以3185平方公里为天花板,这将倒逼上海形成土地生产率高、多中心网络状的紧凑城市。其倒逼作用体现在:一是通过收紧建设用地,逼迫上海的发展模式从土地消耗驱动型向土地效率提高型转变,这就意味着必须提高单位土地的使用效率。建设用地的负增长实际上是要工业用地负增长,这意味着未来5年要把工业用地尤其是低端的工业用地的面积降下来。二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的高效布局。“十三五”期间即便上海守住了2500万人的底线，但如果都挤在市中心及其周围地区肯定不行。这意味着城市空间结构要形成一个以中心城为中心、沿着主要的交通廊道周边发育多个有吸引力的二级中心的城市组合体。

化石能源消费底线倒逼上海建设低碳城市。“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上海的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1.25亿吨标准煤以下。这个硬指标将倒逼上海加快能源转型努力建设低碳城市。能源消耗底线的倒逼作用体现在:城市发展中的能源使用不是可以无限扩大的，对能源消费进行硬约束是要逼迫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生产、城市交通、城市建筑、生活方式进行转型。关键环节是要把煤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降下来,提高外来电和天然气在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同时,要加快与能源增效和低碳发展有关的技术创新。例如,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厂火力发电的效率在世界上是高水平，上海建设科创中心需要多多发展类似这样的先进技术。

城市安全底线倒逼上海建设韧性城市。上海城市发展的风险主要有四大方面,即经济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技术风险,其中重要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等生命线系统的安全性。“十三五”规划提出城市安全底线的概念,意味着上海未来需要努力建设脆弱性低、适应性强的韧性城市。其中,脆弱性是指城市灾害问题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适应性是指城市应对灾害问题的能力。设立城市安全底线,其倒逼意义在于:上海城市发展需要大幅度提高抵抗城市各种风险的能力。一方面,要降低城市遭受各种风险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要提高灾害发生时的应对能力和适应性。守住城市安全底线的关键,是要从末端治理向事先预防转变,建立条块整合、快速反应的韧性城市的治理结构。(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智库主任、教授)

圣人的绩效

任大刚

结舌者言

贵阳市人民政府原市长助理樊中黔穿的一双皮鞋底子换了三次,他还要修补后再穿。他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滥酒。除了实在推不掉的应酬,樊中黔很少去外面吃饭。他喜欢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然后亲自下厨做饭炒菜。2010年9月,樊中黔因收受上千万赃款,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吐鲁番地区水利局原局长曹培武出身贫苦，生活节俭，一分钱的东西都舍不得浪费。他身上穿的旧棉布背心已经穿了30年还舍不得扔掉。平时一日三餐很简单,从不吃肉。2014年9月3日，曹培武涉嫌收受他人贿赂251万余元被批准逮捕。

人前人后的强烈反差，成为最易于传播的案例。这种传播心理,是对表里不如一的不满。其隐含的价值观,是相关官员应当具有趋向圣人的品格,这是公众之所愿。但光有圣人般的清廉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才干。韩非子注意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

话说历山的农夫相互侵占田界,闹得不可开交。舜亲自到那里种田，一年后,田界之争平息。黄河边的渔夫们争夺水中的高地以便打鱼。舜也亲自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渔夫。东夷的陶工制作的陶器很粗劣。舜亲自到那里制陶,一年后,陶工们制出的陶器很牢固。

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虽然都不是舜的职责，但舜前去干这些活,纠正了败坏的风气。舜真是仁厚啊！所以说,圣人身体力行的德行能感化人啊。”

但韩非子从舜的圣人行为中发现了两难。他发问:“舜做圣人功夫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

韩非子继续问:“孔子说尧是圣人。既然是圣人,那么处在君位上，就应当明察一切,使天下风气醇正。如果耕地的、打鱼的不起争执,陶工的活计做得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说明尧为政有失。说舜贤明,就否定了尧的明察;认为尧是圣人,就说明舜的道德教化不可靠。”

更重要的是,韩非子发现圣人之教在政治绩效方面的不“经济”。舜一年纠正一种败坏,三年纠正三种败坏。像舜这样的人,为数有限,寿命有限,而天下人的过错却无休无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无穷的过错,能纠正的就更少了。

韩非子认为,要规范天下人的行为,就该发布命令:“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发布,傍晚过错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第二天早晨过错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完全纠正,何苦要等上一年?舜不采用“法”的办法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亲自操劳,不就是毫无统治办法吗?用身受其苦感化民众,尧、舜也难以做到;而采用“法”的办法，哪怕是庸君也容易办到。要治理天下的人,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却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只能说他不懂得治国之道。

没有人能否认“法”在政治绩效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法如果不能植根于内心判断,而纯粹成为一种“以上级的看法为看法”,那么一旦外在强制力消失，社会与政治失序瞬间即可发生。强大的暴秦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即在于其基本国策法家思想只是提供了一种“外在之法”。

儒家倒是在试图提供“内在之法”,却甚少考虑政治绩效,在危亡之际显得束手无策。因此之故,儒法混用、儒表法里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指导思想。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造就一代又一代表里不一的人格。

春节的“供给侧改革”

朱绩崧

北窗絮语

习惯一个人出远门之后,原本几乎足不出“沪”的我就开始逃年。倒不是家中应酬多，而是吃不消鞭炮吵闹,特别是除夕和所谓“接财神”的那两日。我在越南、香港、广州度过春节,走在闹市街头,不免有几丝旅思客愁,看着路边一盆盆鲜花、金桔树，心头总有一问:“阿拉上海就不能也这样，安安静静过一个甜甜美美的年么？”

今年，我没有春节出行的计划了。修订后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在外环线以内,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春节也不例外,处罚条款也更加具体、明确,可操作性较以往大增。于是,我的新年愿望里,多了一条:但愿《条例》能让土生土长在大上海的我，见证此生第一个静美的本埠春节。

仔细想来，禁燃烟花爆竹，也算是一种“供给侧”改革,革除一种长久以来不利于城市文明发展的劣质“产能”。没有了无序的私燃乱放,对热爱环境的公众而言,有助于降低空气中颗粒污染物浓度,PM2.5等指数不会瞬间高攀，也能有效减少噪声污染;环卫工人能免却毫无必要的工作量;医务工作者可以少处理很多烧伤、炸伤病例;家长也不必提心吊胆,怕孩子中招;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者会自觉推进行业转型;消防、公安等部门也不必数夜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凡此种种,益处多多。这座城市可以在轻松的气氛下进入农历新元。

烟花爆竹不给放,如果做一次街头路人随机调查,那显然不会人人赞成。我甚至可以想见,一些受访者会开口闭口“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这大概也是反禁放派最大的论据了。那“传统习俗”四个字就可以是燃放本身的理由么?身为文字工作者,我认为“传统习俗”并无褒贬,而是中性的。既然是中性,那现实中必然存在良劣之分。农耕社会,要找个开阔的地方,“爆竹声中一岁除”,何其易也。在今日上海这样的特大型都市，楼群密集,人口稠厚,遇到哪位粗心人士买来伪劣产品，火柴一划,弄不巧就是一场零售式的“恐怖袭击”。君子相时而动,时移势易,岂有墨守陈规,不顾现状去保留发扬“传统习俗”之理?纵观历史,人类在从农村走进城市的过程中，抛弃的此类“传统习俗”其实不胜枚举。留恋烟花爆竹,大可不必。至于那些把发财迷梦寄托于某日某夜放几只“高升”的仁兄,更应该明白,如果这都能灵验,经济学家尽数可以下岗去也，银行储备的也不是黄金和钞票,而是鞭炮了。

关于禁放的道理,翻来覆去,差不多也就是这套。但今年我更关注,也更看好的,是全面落实这项供给侧“改革”——要改,要革,就不是纸上谈兵。禁放令,此番颁行的并不是1.0版,以前也有过,但收效并不理想。执行力不足,不禁让我想到前贤的那句“法立而不行,与无法等”。成文法规的生命力固然起源于一纸,但普遍且严格的执行才是保证法规鲜活不死的唯一手段。此番整个上海打起精神,重振旧志，可以说这次改革是一场不允许失败的战役,因为押上的不仅是法规制定者的公信力,更是一个理念: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以上海开放的精神，大气的禀赋,自没有难明之理,理既明白,亦无难行之事。我相信,只要上下戮力，对未来充满信心,除夕一夜安眠之后,迎接丙申猴年的，必将是一座清新美好的国际大都市。

保姆不荒

姜泓冰

拾字街头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国定的假期并没有开始,但路上的车辆逐日减少,没有了堵车的痛楚,上下班路通畅到不能适应，有喜悦,却还有一丝烦恼和心慌——像往年的春节前一样。

同事比我反应更敏锐。几天前已开始絮叨:加班加点赶完手中这一单,绝不能再接新活儿了。小保姆走了，一大家子老老小小,一日三餐烧饭就得动足脑筋,洗衣拖地整理,琐琐碎碎的家务,一天不做、漏了哪样,都要乱糟糟的。春节长假居家，其实就是换个角色,换一种忙碌地过。

幸运的是，据媒体报道,今年春节,上海的保姆荒并没有像往年那样早早出现,家政服务人员留在本地的居多，回乡的只占40%,相对应地,不少市民也要外出度假或者回乡探亲，剩下的缺口不过5%左右,要找个临时顶替的钟点工不会太难也无需“秒杀”,只是节日的劳务价格偏高,尤其是家有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病人或是奶娃一类刚需的，免不了要发愁和感叹，要么是春节累到腰酸背痛，要么赚钱敌不过支付的月嫂薪水，生出“替保姆打工”的郁闷。

节前两会，看到民盟上海市委一份关于家政服务业的集体提案。其中披露，上海835万户家庭中,需要家政服务的高达53%,已在使用家政服务的占46%,从事住家、全日制或钟点工服务的家政服务人员有100万人。职业规模之大,服务影响之众,实在应该唤起社会的重视。而实际上,在这个行业里,绝大多数雇主和保姆都是通过藏在弄堂深处或杂乱环境里、只有一间小门脸儿和一桌一椅若干板凳、并没有登记注册的小中介机构找到彼此的,甚至干脆就是由网络和私人的辗转介绍,身份背景、健康状况,甚至都可以做假;来来去去,也相对自由随意;缺乏规范管理，也没有什么做大做强起来的垄断品牌，是地地道道小而散的市场经济。

作为近400万户上海家庭的一分子，我自己有近20年连续不断接受家政服务的历史，快的时候一个月家里走马灯似的来过四五个保姆或钟点工,慢的时候,一个相互投契的阿姨会相伴十年,直到搬家换环境唏嘘分离,还一直牵记惦念。

由此获得的经验是,没有政府的强势管理,没有“五百强品牌”,这个低门槛的职业虽然偶尔会有耸人听闻的“毒保姆”案,有意外事故导致的责任纠纷,总体上说,家政业却正是一直因为不够高大上、管理粗疏、自由自在而得以生机勃勃、健康地壮大和成长成熟着,按照一个职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内生的动力,变得更稳定、更专业、更美好。

每一个家政雇佣者都能讲出一大堆小保姆、老保姆职业意识、技能和人品素养上的小毛小病、不懂规矩,日常相处多了许多龃龉烦心事；每一个春节,当她们离去，我们也总不免要心慌意乱。年复一年,我们更能看到她们中勤勉能干的一部分，从一无所有到在这个居大不易的城市里扎根下来,开花结果,从农民变成市民，懂得了为自己维权，也会忽然告诉你今年春节不再回乡,而且愿意来加班帮忙……

保姆不荒的春节,虽然在万物萧条之季，手忙脚乱之余,看见一个职业、一个庞大群体的现实演变轨迹，像在雪被底下辨出一丝丝细细嫩嫩的绿芽,仔细想来,便是惊喜。